

# 中国细石器相关问题研究评论

朱之勇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本文对细石器内涵、细石器技术、细石器传统及细石器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作者赞成细石器是由特殊工艺技术制成的石制品，并将其范围限定在与此种技术相关的石制品之内。细石器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石片剥离技术，并非是石器的制作技术；细石器传统所指的应是某种细石器技术的延续。作者论证了细石器技术由石叶技术演化而来的合理性，并指出华北地区起源说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认为中国的细石器有可能起源于俄罗斯贝加尔湖南部和蒙古中部地区。

关键词：细石器；细石器技术；细石器传统；细石器起源

中图分类号：K8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3-0045-07

细石器在中国发现已有近百年的历史<sup>[1]</sup>。若以梁思永先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调查含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起始标志<sup>[2]</sup>，中国学术界对细石器的研究也应有近 70 年的历史了。此间，随着考古资料的日趋丰富，学界对细石器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对细石器内涵、细石器技术、细石器传统及细石器起源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极大地推动了细石器研究的进步、发展。但从目前来看，对上述相关问题的研究，学界还多未达成共识，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当前制约细石器研究发展的瓶颈。基于此，本文将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重新进行梳理、评析，希冀学界早日形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使细石器研究得到突破发展。

## 一、细石器内涵

与国际同行一样，中国学术界对细石器内涵的认识也是随着材料的积累、研究的逐步深入而随之发生着变化<sup>[3]</sup>。

细石器的内涵最初之意是指细小石器，即指形体狭小，制作精细的石制品。但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石器的“细小”只是一种表象，而且“精致”也不等于细石器。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由于石制品的小型化，使得石器的修理痕迹显得比较精致<sup>[4]</sup>。而石制品的小型化往往是由于较差

的石质等原因造成的<sup>[5]</sup>。因此，目前学界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对细石器的内涵加以探讨，此种观点已基本不用。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学术界对细石器内涵的理解存在着 2 种观点。笔者将此 2 种观点称之为细石器内涵的“混合说”和“严格说”。持“混合说”的学者认为细石器不仅仅包括细石核、细石叶等与细石器技术相关的石制品，还应该包括一些非细石器技术产生的石制品，如一些外形较小、形制规整、加工精细的刮削器、尖状器等。但持此说的学者们对细石器标志性遗存的理解上则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细石器技术与非细石器技术产生的石制品都可做为细石器的标志性器物。但为了将含有细石核、细石叶与不含有细石核、细石叶的遗存相区别，并能更好的体现细石器技术的发展程度而提出了广义的细石器、发达的细石器<sup>[6]</sup>；雏型细石器、典型细石器和标准细石器等名词<sup>[7]</sup>。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在含有与细石器技术相关的石制品的遗存中，那些形制规整、加工精细的石制品才能被算作细石器。否则的话，则不能称之为细石器<sup>[4]</sup>。

“严格说”当以安志敏为代表。上世纪 70 年代末，安先生在研究海拉尔的细石器时指出“细石器是一种特殊技术工艺所产生的石制品，原则上以间接打法所剥离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用细

石叶加工的石器为代表,它们一般是为了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专门制作的石刃。严格地讲,细石器一词,应以上述细石核和细石叶有关的石制品为限<sup>[8]</sup>。与“混合说”相比较,此观点对细石器内涵的限定则更为严格,即将细石器严格限定在与细石核、细石叶相关的石制品上。最近也有学者撰文对此观点进行了补充,即认为细石器不仅仅包括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用细石叶加工的石器,还应该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半成品、废品及其它副产品等,也就是说细石器应当包括所有与细石器工艺技术相关的石制品<sup>[9]</sup>。此观点可以说是对安氏“严格说”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从目前细石器相关研究论文来看,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支持者。比较而言,2种观点有着共同之处,就是都强调细石器是一种遗存的组合关系,而非单指哪一类器物。不同的是对这种组合关系内容的认识上。“混合说”是将细石器理解为细石器技术与非细石器技术的共同产物。“严格说”则是将细石器严格限定在与细石器技术相关的石制品的范围内。在这里,笔者倾向于“严格说”,即认为将细石器的内涵限定在与细石器技术相关的石制品范围内为宜。因为从细石器研究史的角度来看,细石器制造工艺的特殊性已逐渐被学界所认识。这一点,无论持何种观点者都毋庸置疑。细石器是由特殊的工艺技术产生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贯穿着细石器技术的全过程,反映着细石器技术从原料选取、毛坯成型、台面生成直至细石叶顺利剥离的每一个环节。而传统观点中被归入到细石器中的那些非细石器技术产生的石制品,如: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无论它们加工的多么精致,在遗存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有多么高也仅是代表着石器的修理技术而已,并不能代表以剥离细石叶为目的的细石器技术。即使是在这些石制品中存在着压制修理技术或间接打击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因素也仅是细石器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并不能代表细石器技术的全部。细石器技术是由多个环节(原料选取→毛坯成型→台面生成→核体固定→细石叶剥离等)组成的,这些环节的完成需要太多的知识、经验、技术或技巧,而这在那些石制品中则多没有体现。因此在技术层面上来讲细石器与那

些非细石器技术产生的石制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将那些不属于细石器技术产生的石制品从细石器中剥离出去,才有益于细石器研究走向深入。

## 二、细石器技术

细石器技术应专指与生产细石核、细石叶相关的技术。这一点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使是持细石器内涵“混合说”者,也不曾予以否定<sup>[4]</sup>。目前来看,对细石器技术的性质进行探讨的论文并不多。最近有学者撰文认为,细石器技术是指“制造以细石叶为母体的石制工具的特殊的制作石器生产技术,……是制造细石器工具的一系列生产技法和工序,……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创造的特殊的打制石器的“高新”技术<sup>[9]</sup>,即将细石器技术界定为一种石器生产技术。笔者通过对虎头梁遗址中细石器材料的长时间观察、研究<sup>[10]</sup>,认为细石器技术与其它一些剥离石片的技术(如石叶技术)在毛坯预制、石核成形、台面预制及剥片方式等程序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如它们所选取的石料都较少有瑕疵,石核毛坯多需要修理出固定的形状,台面多需要预制修理,石片的剥离则需要娴熟的技术等等;其次从笔者对虎头梁遗址中细石叶的观察来看,并不是所有细石叶都需要加工才能使用,有些细石叶在没被加工的情况下也同样能够使用。这就说明,从选料→毛坯成形→台面生成→细石叶剥离这一系列过程来看,细石器技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制造石器,而是为了获取更加适合利用的工具毛坯——细石叶;从对那些被加工过的细石叶的观察来看,所采用的加工技术与其它一些小石器的加工技术(如萨拉乌苏的小石器)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就这一点来说还很难将细石器技术当作一种独立的石器加工技术提出来。所以笔者认为细石器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变革性技术,应当与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一种新的剥离石片的技术模式,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石器加工技术。

细石器技术应专指从细石核上剥离细石叶的一种剥片技术,这一技术过程中包括了为制作出合适的细石核而进行的石料的选取、毛坯的预制、台面的修理等项程序以及石核的固定手段、

细石叶的剥离方式等内容。细石核是为了便于生产细石叶而被加工成各种形状的,它仅反映了细石叶的部分生产过程,而不是细石器技术的全部<sup>[11]</sup>。构成细石器技术的要素也不仅仅只包括能够娴熟的运用软锤技术和压制技术,能够掌握调整石核台面进行连续剥片的能力及充分了解石片背脊控制石片形状的原理等3个方面<sup>[12]</sup>。它还应包括对石料物理性质的认知、石核形态的控制以及细石核的固定等诸多方面。它的表现形式包括了在遗址中所能发现的石核毛坯、细石核及其半成品、细石叶及其制品以及预制石核和剥离细石叶时所产生的废片、碎屑等一切与细石器技术相关的石制品。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虽然细石叶制品可以当作细石器技术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我们不能说细石叶制品是由细石器技术产生的,因为它应该属于制作工具的技术范畴之列,而非属石片的剥离技术之列。

### 三、细石器传统

“细石器传统”一词是学界在反思“细石器文化”概念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有关细石器的早期研究中,学界倾向于将那些凡含有细石器的遗存统称之为“细石器文化”,并认为它是北方草原、荒漠地区的一种游牧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截然不同,只是在两者接触地带才有的所谓混合性质的文化遗存<sup>[13]</sup>。随着材料的不断丰富、研究的逐渐深入,含有细石器的遗存的复杂性逐渐被学界所认识。所谓的“细石器文化”在时间跨度上贯穿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甚至到历史时期的诸多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在地域上也不在局限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在黄河流域以及远到青藏高原,甚至包括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蒙古高原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在内的整个东北亚地区和北美洲的北部都有分布<sup>[14]</sup>。也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与细石器相伴生的文化遗存也非常的复杂,除了非细石器技术所生成的打制石制品外,还包括磨制石器、各类陶器甚至青铜器等。由此可见将含有细石器的遗存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来对待,显然有悖于考古学文化的经典定义<sup>[15-16]</sup>。因此有学者建议尽可能不用“细石器文化”一词,必要时可用细石器工艺传统(简称细石器传统)这一概念来代替,以

便适当地说明它们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sup>[8]</sup>。

目前,虽然以“细石器传统”概念取代“细石器文化”被诸多学者所接受,但对此概念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多数学者在采用“细石器传统”一词时是将其理解为含有细石器内涵的文化组合,等同于某种石器工业,强调的是一种遗存组合关系,而没有将细石器框定在一种特殊、复杂的工艺技术之中<sup>[17]</sup>。另一种观点则是将细石器传统理解为“细石器工艺和与其共存的其他打制石器工艺在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技术综合体对相应的生存环境、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从狭义的,纯技术的角度讲,细石器传统是特指一种以细石器工艺为主导的石器工业技术的文化表现。综观这两种观点可看出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文化遗存的组合关系,不同之处是后者更看重技术层面而非个体石制品之间的组合。

文化传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指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本来就有,且通过时代流传下来的那些文化元素和文化从<sup>[18]</sup>。笔者认为与细石器共存的遗存组合太过复杂,即使是将细石器技术和与其共处的石制品组合作为细石器传统的内涵,也难免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或更晚的历史时代的含细石器遗址中,磨制石器已出现更多的类型,细石器技术与这些石制品之间的组合关系又更加的复杂。笔者认为细石器传统应当指的是某种细石器技术的延续。如在我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遗存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分出多种细石器技术。根据细石核制作工艺的不同,可分出河套技术、桑干技术等细石器技术类型<sup>[19]</sup>;根据使用策略的不同又可分出不同的技术类型<sup>[20]</sup>。可以说每种细石器技术即可称之为某一细石器技术传统。如在同一区域内早、晚不同的细石器遗址中同时发现河套技术,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两处不同时期的遗址中存在着同一种细石器传统,即河套技术传统。

### 四、细石器起源

细石器自在中国境内被发现以来,其起源问题既被国内学者所关注和争论。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细石器起源于何处以及细石器起源于何种技术这两方面问题上,



而对细石器出现的时间及其所产生的环境背景等方面问题则已基本达成共识<sup>[21]</sup>。

#### 4.1 争议的问题

##### 4.1.1 细石器起源于何处

从目前研究来看,对中国细石器起源于何处的争论,国内学术界共存在 3 种观点。即以裴文中为代表的西伯利亚起源说,以贾兰坡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起源说,以及杜水生最近提出的虎头梁型细石核起源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下川型细石核则是本地区起源的观点,笔者将其称之为中国细石器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说”。

##### 4.1.1.1 西伯利亚起源说

裴文中先生是最先关注中国细石器起源问题的国内学者。他在《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中写道“在西伯利亚境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之遗物,与欧洲之奥瑞纳文化者及马格德林文化者,均甚相似。在贝加尔湖附近,此种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文化,更渐次演变而为中石器时代之文化,其遗物中如扁平多齿之鱼叉及短小之圆刮器等,均与欧洲阿奇利文化者相似。此种文化,分布于亚洲之北部及欧洲之中北部,成为一独立之系统。时间前进,此系统之文化更向中国境内移动,因地理环境之限制,演变而为细石器文化。中国之细石器文化虽与欧洲所发现之同时代之文化,稍有不同,但此为地方性质,实均为同一之系统”<sup>[13]</sup>。从中可看出,当时他认为中国的细石器是起源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附近,并且与欧洲的同时期文化属同一文化系统。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也可能是起源于我国东北,但还不能完全推翻起源于西伯利亚”<sup>[22]</sup>。

##### 4.1.1.2 华北地区起源说

贾兰坡先生是细石器华北地区起源说的首倡者。上世纪 70 年代初,贾兰坡在其《山西峙峪遗址发掘报告》一文中提出了华北“两大传统”的理论学说,认为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其中之一是以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为特征的“匱河——丁村系”(也称“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亦称为“大石器传统”);另一个系统则是以不规则小石片制造的各种刮削器、雕刻器为特征的“周口店第 1 地点——峙峪系”(也称“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或称为“小石器传统”)。同时他

还指出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是由“周口店第 1 地点——峙峪系”发展而来的,它的前身可直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文化。峙峪遗址是最为古老的含有细石器遗存的遗址。在该遗址中可以“找到发达的细石器技术的萌芽和组成细石器文化的石器的原始祖型”,“它是北京人文化与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其绝对年代为距今  $28135 \pm 1330$  年<sup>[6]</sup>。在其后的研究中,通过与周边国家、地区细石器遗存的比较研究,以文化内涵和绝对年代两方面证据为依据,贾兰坡提出了广泛分布于东北亚地区的细石器文化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的学术观点,并且指出了细石器由华北地区向其它各地区传播的路径<sup>[23]</sup>。华北地区起源说一经提出,即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支持者甚众。继贾老之后,在细石器材料进一步丰富的基础上,有的学者进一步论证了华北地区起源说的合理性<sup>[24]</sup>;也有学者在这一学说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了细石器在华北地区起源的链条<sup>[25]</sup>;还有学者以此学说为基础,将细石器的源头追溯到了上百万年<sup>[26]</sup>。

##### 4.1.1.3 多地区起源说

杜水生新近发表文章认为“在华北和东北亚这一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细石器文化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起源途径,一个是下川型细石器传统,一个是虎头梁型细石器传统,虽然二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在地理分布上有一定的重合,甚至一些器物形态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同的技术风格仍能够使我们追溯其源流。”“下川型细石器文化可能起源于华北地区,而虎头梁型细石器则可能起源于西伯利亚”<sup>[27]</sup>。

#### 4.1.2 细石器起源于何种技术

对于细石器起源于何种技术的问题,国内基本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起源于石叶技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起源于华北地区的小石器传统。

20 世纪 90 年代,张森水先生在对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进行研究时,将含石叶技术与细石器技术的遗存合称为“长石片——细石器工业类型”,并指出“一般来说长石片工业是细石器工业的祖型”,从而提出了细石器技术可能是由石叶技术发展而来的观点<sup>[28]</sup>。这一观点提出后,

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从论者的观点来看,多数学者都认为细石器技术并非由石叶技术派生出来,而是起源于华北地区的小石器传统。例如盖培认为细石叶不仅仅是石叶的细化,两者的剥片技术明显不同,在石核修理技术上也有异,不存在传承关系<sup>[29]</sup>。李炎贤在划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时也主张石叶文化系列和细石叶文化系列是平行发展的,而不是先后继承发展的。其一方面原因在于,石叶技术的典型代表水洞沟遗址与下川、薛关等典型细石器遗址的绝对测年数据都在一个相当的变异范围内,很难确定哪一个文化系列更早一些;另一方面原因在于,石叶和细石叶都有悠久的历史,它们平行发展并非由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而是在较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不过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分别发展成为文化系列<sup>[30]</sup>。不过从水洞沟遗址的最新发现和测年结果来看,中国细石器工业的出现要晚于水洞沟文化。所以有学者推测,“从西方、北方传入的以预制石核为主要特征的石叶技术在水洞沟与中国北方已有的砸击技术发生了融合,而这种融合发生在质地优良的燧石材料上,便孕育和产生了细石器文化,并由此扩散到整个华北和周边地区”<sup>[31]</sup>。

## 4.2 几点看法

### 4.2.1 华北地区起源说的1点疑问

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境内细石器遗址的分布特征整体上呈半月形分布<sup>[32]</sup>。但我们仔细分析即可看出,我国的细石器遗址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分布较为集中,而在西南地区则是零星分布,且遗物多为地表采集。结合蒙古<sup>[33,34]</sup>、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sup>[35,36]</sup>和西北美<sup>[37]</sup>地区细石器遗址的分布情况,我们可看出,整个东北亚——西北美地区细石器遗址分布的主要特征是,大多数细石器遗址都分布在我国北方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而在西北美及我国西南地区则分布较为零星,且年代相对较晚。我国华北地区正处于这一大的区域范围内的南部边缘地带。如果承认华北地区是整个东北亚地区细石器的起源地,那么我们很难解释在没有类似于珠穆朗玛峰那样的地理障碍下,为何细石器向北部发展有着强劲的势头,而却较少向南发展?因此从遗址分布上来看,如果承认华北地区细石器起源说的合理性,

那么须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细石器遗址的分布特征做出合理的解释。

### 4.2.2 细石器最有可能由哪种技术演化而来

目前,国内学者多数倾向于认为细石器起源于华北地区的小石器传统,其依据主要在于文化内涵的相似性。华北地区的小石器传统源远流长,石器的小型化特征可以说由来已久,在该地区延续了上百万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发展成细石器,从形态、大小的角度来看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以上论据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合理性。原因在于,在细石器研究的初期阶段,学界对细石器的认识仅停留在细石器即是指细小石器这一层面上,其内涵范围很广,除了包括当今学界认同的细石核、细石叶和细石叶制品外,还包括一些细小的盘状石核、多面体石核、两极石核、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由此可见,如此大的内涵范围,很容易将细石器与小石器传统联系起来,认为其与小石器传统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随着细石器研究的逐渐深入,特别是安志敏于上世纪70年代末对细石器的文化内涵加以限定后<sup>[8]</sup>,学界逐渐倾向于认为细石器是由特殊的工艺技术加工而成的石制品,其文化内涵仅仅限定在与此种加工技术相关的细石核、细石叶及其制品上,其它石制品则被排除在细石器之外。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新的角度上重新审视细石器与小石器传统的关系,即可看出两者之间除了在大小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外,技术传承上已经相差很远了。笔者认为细石器的主要特征是在于其加工技术的特殊性,而并非在于其外部的形态特征。正是基于此种原因,我们在探讨细石器起源时,不能仅仅关注细石器的外部形态及大小,而更应该关注工艺技术上的连续性。华北地区由来已久的小石器传统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仍然属于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范畴。表1是关于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石叶技术和细石器技术3者之间在一些技术特征上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台面预制、石核形态、对石片的控制能力,还是剥片方式等技术特征方面,小石器传统与细石器技术两者之间相去甚远,相反石叶技术与细石器技术之间确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表 1 不同技术类型之间的比较

比较项目→	A	B	C	D	E
简单的石核 - 石片技术	N	N	N	d1	e1
石叶技术	Y	Y	Y	d3	e3
细石器技术	Y	Y	Y	d2	e2

A 是否存在台面预制现象

B 是否存在固定的石核形态

C 能否经常性剥制出较为规整的石片

D 剥片方式：d1 直接打击；d2 间接打击；  
d3 直接打击 + 间接打击

E 石核在剥离石片时是否需要固定：e1 不需要；e2 需要；  
e3 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

N 表示 NO；Y 表示 YES

石制品的小型化趋势与细石器起源实际上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因为无论石制品的大小如何改变，都不意味着其剥片技术会必然发生变化，也不意味着古人类控制石片形制的能力会随之增强。从技术传承的角度来看，较之小石器传统，石叶技术只需向前迈进一小步，即可孕育出细石器技术。

#### 4.2.3 中国的细石器起源于何处

细石器技术与石叶技术较为接近而与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相去甚远，但仅凭此一点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细石器技术是由本地区的石叶技术派生出来的。原因在于目前在中国境内存在石叶技术而不存在细石器技术的典型遗址仅发现水洞沟一处，且该遗址与其他较早的细石器遗址之间的绝对年代值相差并不是很大。因此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的细石器技术是由本地区的石叶技术发展而来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的细石器技术既不是由本地区的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发展而来也不是由石叶技术发展而来，那么它究竟来源于何处？在这里笔者倾向于认同 Ted Goebel 的观点。Ted Goebel 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北亚地区的细石器遗存最早应该出现于末次冰期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南部和蒙古的中部地区。此种技术是当时古人类用于猎获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一种狩猎技术。随着末次冰期极盛期的到来，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开始向南迁移，此种技术也由古人类追赶该动物群而被带入我国的华北地区。末次冰期极盛期过后，气候开始转暖，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又开始向北移动，此种技术亦随之向北移动回到西伯利亚，并一直向北挺进，直至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地区<sup>[38]</sup>。此理

论在西伯利亚发现的一些典型遗址（如阿夫托瓦山 号遗址和科科列瓦 号遗址）中得到印证。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属于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中的哺乳动物化石与细石器遗存共存。

Ted Goebel 的理论也正好能够对东北亚地区细石器遗存的分布状况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这一理论可看出分布于我国华北（包括山西、陕西、河北和河南等地）、华中（包括山东以及江苏的北部地区）地区的细石器遗存可以被看作是整个东北亚细石器遗存分布带的最南缘。而这一地区与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分布的最南区正好重叠<sup>[39]</sup>。因此完全可以认为细石器技术即是一种追寻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狩猎技术。中国的细石器技术应该是起源于贝加尔湖南部和蒙古的中部地区。至于这一地区的细石器是从何而来？笔者认为是由当地的石叶技术发展而来的，因为在这一地区存在着时代较早的石叶遗址。例如著名的卡拉 - 博姆（Kara-Bom）遗址即是其中之一，这个遗址的年代可达到距今 4 万年<sup>[40]</sup>。

注释：

[1] 安志敏：《中国细石器发现一百年》，《考古》2000 年第 5 期，45-56。

[2] 安志敏：《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梁思永先生》，《考古》2000 年第 7 期 92 页。

[3] 盖培：《谈谈细石器一次的涵义》，见高星，候亚梅主编：《20 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2 年 11-12 页。

[4] 王益人：《关于下川文化的几个问题》，见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北京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09-128 页。

[5] 陈淳等：《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 1998 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9 年第 18(4)期 223-239 页。

[6]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 年第 2 期 53-57 页。

[7] 葛治功，林一璞：《大贤庄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兼论我国细石器的分期与分布》，《东南文化》1985 年第 1 期 2-17 页。

[8] 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 年第 3 期 289-315 页。

[9] 沈辰：《细石器工艺、细石器传统及山东细石器研究的初步认识》，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教授八十年华



诞》，香港 2004 年 45-56 页。

[10] 朱之勇：《虎头梁遗址石制品研究》，《中国科学院博士论文》2006 年。

[11] 陈淳：《中国细石器核类型和工艺初探——兼谈与东北亚、西北美的文化联系》，《人类学学报》1983 年第 2(4)期 331 页。

[12] 杜水生：《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07 年第 2 期 148 页。

[13] 裴文中：《中国细石器文化略说》，见裴文中著：《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1948 年 137-146 页。

[14] 安志敏：《中国细石器研究的开拓和成果——纪念裴文中教授逝世 20 周年》，《第四纪研究》2002 年第 22(1)期 6-7 页。

[15] 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 年第 4 期 169-172 页。

[16] 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 年第 1 期 81-89 页。

[17] 李永宪：《中国西南细石器与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01-110 页。

[18]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传统文化”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

[19] Tang Chung, Gai Pei. Upper Palaeolithic Cultural Traditions in North China[J].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1986 年第 5 期 339-364 页。

[20] 朱之勇，高星：《虎头梁遗址中的细石器技术》，《人类学学报》2007 年第 26(4)期 305-310 页。

[21] 王幼平：《试论环境与华北晚期旧石器文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1 期 113-120 页。

[22] 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年 40-42 页。

[23] 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和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 年第 16(2)期 137-143 页。

[24] Gai Pei. Microlithic industries in China[A]. Ed. Wu Rukang and John Olsen: *Paleoanthropology and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ress, 1985 年 225-241 页。

[25] 李壮伟，尤玉柱：《从桑干河流域几处遗址的发现看我国细石器文化的起源》，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3 年 501-509 页。

[26] 侯亚梅：《“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命名与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03 年第 22(4)期 279-292 页。

[27] 杜水生：《楔型石核的类型划分与细石器起

源》，《人类学学报》2004 年第 23(增刊)期 211-222 页。

[28] 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人类学学报》1990 年第 9(4)期 322-333 页。

[29] Gai P. Microblade tradition around the northern Pacific rim: a Chinese perspective[A]. 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年 21-31 页。

[30] 李炎贤：《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划分》，《人类学学报》1993 年第 12(3)期 214-223 页。

[31] 高星，李进增，D.B.Madsen 等：《冰洞沟的新年代测定及相关问题讨论》，《人类学学报》2002 年第 21(3)期 211-218 页。

[32]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童恩正著：《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 2004 年 362-393 页。

[33] Деревянко А.П., Кривошапкин А.И., Ларичев В.Е., Петрин В.Т. Палеолит Восточный предгорий Арц-Богдо.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01.

[34] Johannes Maringer. Mongolia before the Mongols [J]. *Arctic Anthropology*, 1963 年第 1(2)期 75-85 页。

[35] Борисковский П.И. Палеолит СССР.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4.

[36] Деревянко А.П. Палеоли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коре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3.

[37] Douglas D. Anderson: *Microblade traditions in northwestern Alaska*. *Arctic Anthropology*, 1970 年第 7(2)期 2-16 页。

[38] Ted Goebel. The “Microblade adapt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of Siberia during the late Upper Pleistocene. ED. Robert G. Elston, Steven L. Kuhn: *Thinking small: Global Perspectives on microlithization*, *Arch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rlington, 2002 年第 12 期 177-133 页。

[39] 金昌柱，徐钦琦，郑家坚等：《中国晚更新世猛犸象（Mammuthus）扩散事件探讨》，《古脊椎动物学报》1998 年第 36(1)期 47-53 页。

[40] Kazuto Matsufuji. Appearance of Early Blade Technique in Northeast Asia.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00, 19(Supplement): 166-169.